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主編：陈小津

（内部读物）

前 言

去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今年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成立新四军 70 周年。红军长征的历史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都是我党、我军，党史、军史、战史中最光辉的篇章。党的十二大之后，遵照小平、耀邦及中央的指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同志担任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编写委员会主任；叶飞任副组长、编写委员会副主任。历时十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丛书胜利编写完成。在此丛书中，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了建党、建军、建国以来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三四万人(其中包括 2 万多伤病员)。他们同苏区人民一道，在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或斗争形势恶化，相继转入游击战争。从这时起，迄 1937 年 12 月新四军军部宣告成立，南方 8 省红军游击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南方 8 省——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和河南的广大农村，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洗礼，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地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土地革命遭到挫折和主力红军北移后，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坚持斗争，百折不挠，逐渐形成了 15 个游击区。这些游击区，从其历史渊源上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苏区及其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成的，如赣粤边、闽赣边、闽西、皖浙赣边、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游击区；二是一直未形成苏区的老游击区或早已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的，如闽粤边、闽中、湘南、琼崖游击区；三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如浙南、鄂豫边游击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战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各自为战，并由此带来异常的艰苦性。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无法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各方面情况靠自己了解，事变发展进程靠自己判断，行动方针靠自己确定。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各游击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但在具体斗争上却是独来独往，无法协同行动。由于环境险恶，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而变节投敌，游击队不仅要同外部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敌人（叛徒内奸）作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这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与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断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各地红军游击队不得不长期生活与转战于穷山僻岭，风餐露宿，以大树遮身，以野果充腹。其艰苦境况，亘古罕闻。然而，残酷的斗争与风雪饥寒，并没有征服游击健儿，反而使他们磨砺得更加坚强与成熟。他们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同舟共济，战胜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终于到达胜利的彼岸。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主要功绩在于：第一，在初期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第二，在尔后的3年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8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第三，在南方8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保持了共产党的旗帜，保护了群众利益；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为尔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第四，在我国南方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南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五，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发展和丰富了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六，为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有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当代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给予高度评价：“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毛泽东也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

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军事史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34年秋至1937年冬，分散在南方8省(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东(含琼崖)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面对几倍乃至几十倍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的残酷“清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含辛茹苦，矢志不移，终于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汇编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抗战主力之一——新四军。它是中国党内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为了纪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新四军成立70周年，深切缅怀陈毅、谭震林、张鼎丞、粟裕、曾山、陈丕显、叶飞、黄道、黄知真、钟期光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一辈革命家，特将他们生前回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文章，收集、汇编、出版。这些文章真实反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反映了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教育启迪后人，不忘过去、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目 录

- | | | |
|-----|----------------------------|-------------|
| 1 | 三年游击战争回忆（节选） | 陈 毅 |
| 30 |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 张鼎丞 邓子恢 谭震林 |
| 60 | 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 粟 裕 |
| 84 | 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 粟 裕 |
| 120 | 永留正气在世间——追忆曾山同志 | 王 震 |
| 126 | 曾山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 曾 山 |
| 129 |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节选） | 陈丕显 |
| 169 | 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 | 叶 飞 |
| 193 | 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 | 黄知真 |
| 232 | 《三年游击战争》序言 | 郭沫若 |
| 236 | 三年游击战争 | 方 方 |
| 272 | 闽西南军政委代表方方给中央的报告 | 方 方 |
| 292 | 坚持在湘赣边区——回忆红军北上抗日湘赣苏区的对敌斗争 | 谭余保 |
| 298 | 高举红旗 坚持斗争 | 傅秋涛 |
| 339 | 红旗不倒 | 钟期光 |
| 344 | 三落三起忆当年 | 谭启龙 |
| 356 | 回忆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 刘培善 |
| 363 | 坚持在湘赣边区三年 | 段焕竞 |
| 385 | 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谭余保同志 | 段焕竞 |

393	他是革命强中强——回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刘培善同志	罗维道
400	我在湘赣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经历与回顾	朱云谦
418	艰难的岁月	杨尚奎
435	寻粮脱险记	康 林
439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	宋生发
451	陈毅同志在我家	周 篮
456	回忆范乐春	温仰春
466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	陈 挺
505	回忆黄道同志	童惠贞
515	闽东北游击区的开创与发展	饶守坤
542	难忘的战斗岁月	刘玉堂
551	豫鄂边的红旗	王国华
560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卢 胜
583	挺作南天柱	冯白驹
590	红旗不倒	冯白驹

三年游击战争回忆*（节选）

陈 毅

- 一、关于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略）
- 二、关于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略）
- 三、关于突围的情况（略）

四、关于过渡时期问题

从野战军 1934 年 10 月 10 号离开中央苏区，到 1935 年 4 月我们在油山地区与李乐天他们会合为止，共 5 个多月的样子。有这样一个政治估计：以前，中央苏区是一个大规模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苏区和白区的对立是大规模的政治对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对峙局面，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瑞金抵抗，这个战争进行了 10 年。到 1934 年 10 月 10 号，形势越来越紧，开始了三年游击战争。以后，我们到油山，这是个转变，是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游击战争，转变到游击战争。老的形势转变到新的形势，老的局面转变到新的局面，老的斗争方法转变到新的斗争方法。这不像电灯开关一样，闭就闭，开就开。其实你关了以后，电波也不是马上停。形势变得快，我们适应得慢。野战军突围，部队要分散。野战军那边

* 此文是陈毅 1957 年 7 月 18 日至 27 日的讲话录音稿，共 9 部分，这里节选了 4 部分，并对一些史实作了订正。

要我们供给情报，老百姓要动员，东西要疏散……过渡用了5个月。我们到了油山，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垮台了，正式开始了游击战争，这是个转折。我们能坚持下来，同敌人斗，创造新的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像黄河决堤，水到处淌，敌人找不到目标。敌人来势汹汹，我们5个月就把这个局面应付过去了。过渡时期结束，新的斗争方法——游击斗争开始了。野战军到西边，要过金沙江，和张国焘会师，再跑远一点，可能有抗日战争。日本人一进攻，可能有新的局面(当然，那时还看不出国共合作的可能)，可能是创造个大的苏区。那时不知道长征要到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是往西边走还是往北边走那时很难说。那时只看到和张国焘会合，局面可能会好一些，但要费很大的力量，因为知道张国焘这个人靠不住。我们站稳站不稳，最重要的是看这个转变，看能否在这个大的革命中间掌握转变的关键。中央苏区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军入境，就是标志着老的局势结束，要转变到新的局势，新的局势开始了。中央苏区有很多县，三十几个县委，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关键。所以没有转过来，是地方党领导上没有适应。我们到了信、南、康，会合了赣粤特委，依靠这个地方就转过来了。他们的斗争方法，就完全依照我们在瑞金拟定的那一套。

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失败，赶快走，赶快收容，赶快退却，撤出来。我们要配合野战军。要经得起这个失败，以游击战争的形式，积蓄和保存力量(主要是保存力量，保存一部分干部)，适当地利用机会发展，改善装备，扩大游击队，扩大根据地，中央军搜山、“清剿”，目标大了就会损失，将来应付大的事变没有力量。中国革命要胜利，一是靠我们坚决扩大力量，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光是靠我们也难。列宁说过：统治阶级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生活下去了，中国革命才能胜利。革命力量强大了，超过反动派了，当然革命就成功了。敌人三四个师，分散在十几个县。我们削弱他，牵制他，搞一个，少一个。我们苏区有几百万老百姓，抵抗这5万军队。我们把根据地工作做好，调动敌人，打他们。小部队搞点情报，搞点武器。要警告反动派，哪个镇压，哪里就打他一下，

保护老百姓，不让老百姓失望。中央苏区敌人的乡公所、区公所很好打。搞一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蒋介石内部可能会分裂）。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可能有一次大变动。

这时，还有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拼。说：苏区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拼掉几个算几个。他们不懂得，只要保存下来，都是革命的种子。剩下个战士，将来可以当连长、营长，剩下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做省委书记，怎么能拚掉呢？这是盲动主义。

还有一种是消极打埋伏。大失败以后，如丧家之犬，悲观失望，不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消极的打埋伏，就要走向土匪主义，变成土匪：搞点好的吃，搞女人，搞很多钱，很好的衣服，然后一跑，向上海、香港跑，往外国跑。那时候做梦都梦到敌人，我们也是一样。做梦梦到被敌人抓到了，做梦梦到被包围了，打伤了，警惕性很高。像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李天柱、刘伯坚等中央的高级干部、老党员都打死了。几乎每天晚上梦见他们，有些神经衰弱的人更不用说，看到敌人强大，吓倒了。

我们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斗争：反对盲动，反对悲观失望和消极，我们的正确路线是：保持干部，保持游击队，保持政治旗帜。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打破敌人的“清剿”来壮大自己，恢复中央苏区的工作。要保持过去红军艰苦朴素的生活，要做宣传、组织工作，要进行干部训练。老百姓家上午去，下午也去。泽村、西村，几十里以外也要去。找关系，和老百姓谈谈，吸收和总结经验，搞统一战线。队伍到前面打游击去了，在深山荒野设立休养所、休养站。死了埋掉，活着的就开会，做工作，不能躲在山洞里什么也不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旧的斗争结束，新的斗争开始。

五、关于敌人方面的情况

现在再讲讲敌人方面的情形。敌人是取得了大胜利。1次“围剿”、2

次“围剿”、3次“围剿”、4次“围剿”都遭到失败。5次“围剿”胜利了，占领了中央苏区这样一个最大规模的苏维埃区域。中国报纸、外国报纸一天天叫。记得野战军出动3天以后，帝国主义报纸说：“现在中国内部的红国亡国了。”帝国主义庆祝，趾高气扬地庆祝。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到处开庆祝大会。还搞什么参观共区，参观“剿匪”。当然，有些报纸也晓得没有消灭红军主力，红军主力向西边走了；他们也懂得没有消灭红军主力是大祸害，革命运动会很快蔓延，中央苏区包的火蔓延开来不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利用这个矛盾。他们幸灾乐祸，希望扩大矛盾，不希望蒋介石完全胜利。英、美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收拾这个局面。

在蒋介石看来，胜利是胜利，但还不好办，那么大的区域能没有游击队？敌人并不因为胜利冲昏头脑。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部队。并指令汤恩伯、余汉谋南北开军事会议，要彻底消灭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尤其是不让中央苏区再来一个“死灰复燃”。于是斩草除根，掘地三尺，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游击队很坚决，有政治目的，不在金钱，也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游击队和当地的老百姓结合起来，老百姓接济情报、粮食)。因此，他们用一切办法，企图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把游击队孤立起来。游击队得不到情报，得不到粮食，孤立起来，一年就死了。像捉鱼一样，把水抽干。具体办法就是封山，划分区域，封锁山区。敌人把山上所有的庄子、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平原，猪啊、羊啊都带出来，把山封起来。山头是碉堡，不准进去。以后就是搜山，梳篦式地搜山。东边走个队伍，西边走个队伍，坑里走个队伍，到处都是队伍。他们子弹多，到处打，还带着猎犬。野猪、山牛、豹子、獐子到处跑。我们要是下山，到了白区，老百姓不敢招待。有的向敌人报告，敌人马上就追，使我们不能停脚。追你个几天几夜，你还不是完？老百姓被逼着退到平原，找个地方搭起棚子，一组一组住起来，编保甲。早晚要点名，早起点一次，晚上点一次。搞连坐法，一个人留“坏人”，

一家连坐；一家连“坏人”，几家连坐。地主的团队很厉害，有阶级仇恨。他最熟悉你，什么地方人的口音他也最熟悉。他们早晚来检查，有时早上来，有时晚上来，有时下午来，有时两个礼拜不来，然后突然来一下。山头上、山坳子上修了碉堡，放上哨兵。他还怕控制不住，经常派人去试探：“我是打散的游击队，弄点饭吃吧！”老百姓答了话，开了门，马上被抓起来，罚500块、罚1000块。所以那次我们到篾匠家去，喊门喊不应。就是曾纪才那样很熟的人他们也不接待，还有让叛徒去喊。他抓住你，你叛变了。他就利用你去喊。所以生疏的人老百姓固然不敢答应，就是很熟的人也不敢。刚才你来过，晚上来就不招待，喊也不敢答应，要不很危险，老百姓锻炼得警惕性很高。敌人有时一个礼拜才来：“同志，开门呀！”你不应，他走了。过了两三天又来，你一应，他就抓，抓住就杀。有时我们以为敌人走了，进去就被抓住了。有时敌人不到庄子上叫门，他晓得哪几个庄子常有游击队的人来，他派叛徒到路旁草里躲着，看你应不应。还有，他们搜山，搜不到(游击队比他高明)就装老百姓，找一个妇女或一个老太太走在前头，搞些饭拿着，喊：“游击队同志们，反动派走了，我给你们送饭来了。”或者说是送消息的，或者装着砍柴的、打猎的，装着砍竹子做篾活的、搞香菇的、烧炭的，你一出去就被抓住，抓住就让你带路。因为那时常有叛徒带着敌人来抓。所以我们派人出去后，如果等时间太久，我们就搬家。他们有时到高山上看哪里冒烟，一见冒烟就知道我们在做饭，便派人去搜。所以我们白天不能做饭，晚上煮饭还不能有火光。一做三餐，另外两餐冷饭带着第二天吃。不能大声讲话，敌人听到讲话就来。敌人1个连、1个排住在坳子上四面看，常常因为我们咳嗽出乱子。敌人还在群众中宣传：中央苏区失败了，游击队还有什么用？没有希望了。看老百姓不相信他那一套，起不了作用，便说游击队是害老百姓的，不要跟他们干。欺骗不成就吓唬，压迫老百姓、小孩子讲我们的情况。还有收买。他们拿钱给老百姓，或者给孩子买钢笔。又说：朱毛才是真正的红军，为什么不跟着走啊？这些，当然老百姓很容易识破。不过这也说明：敌人想了很多

办法。他们就是这样，军事上“搜剿”，筑碉堡封锁，昼夜巡逻，突然袭击；政治上用连坐法、保甲制度，收买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搞叛徒。用这些办法来对付我们，妄图孤立游击队，使老百姓和我们分离。敌人方面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敌人的这种办法当然是白搭。敌人分区了，我们也分区活动。南雄北山是一区，油山是一区，信丰、南康、坑口圩、长安圩是一区，龙南、定南、虔南是一区。敌人晓得我们会跳，我这里住个把月，那里住几天。他搞北山，我们跳到油山；他搞油山，我们跳到北山；四个地方同时“剿”，没有地方跳，我们就到边缘区、白区，靠着他们连部营部的地方呆着。我们领导机关就是这样。他们有时装样子，看来是搞这里，实际上搞那里。这边一“剿”，你一跳，他那边就打枪，用打鸟的办法，瞄准的时候把枪举高些，一飞就打到了，因此判断局势要很准确，不弄实了不走，不准就吃亏。虚晃一枪，他跑到那边去了，我们回去睡觉。这样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不会吃亏。

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我们真正与群众结合，军事配合政治，打击敌人。敌人根本的致命伤，就是 we 和群众这个结合。他们根本不行，他们与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我们与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农民支援我们。共产党来了，农民和共产党成了知心的朋友。农民有阶级觉悟，打土豪，分得了土地。共产党给他报了冤、报了仇。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要跟着共产党，共产党和他们在一起，共产党胜利了，他们才能出气。他们不相信敌人，敌人在那里没有做什么好事。从军事力量上来说，敌人不可能长期控制那里了。主要是利用地主。把地主搞掉了，敌人控制不了，农村还是我们的。老百姓依靠游击队，不依靠敌人。他们那个封山、封坑很厉害，老百姓一下都搬出去了。几十里路、几百里路大山区，一个人也没有。房子没有人住，荒荒的青草。但还有个问题，老百姓要生活，敌人不能掏腰包养活老百姓，而且还要收粮食、抽税。老百姓就嚷：我没饭吃，我要进山打柴，进山种田。敌人没办法，只好派兵押着老百姓

去做。老乡们带着牛，带着老婆、小孩，早出晚归。那要好多兵来押哪。从清明节开始，到秋收后这一段，春天、夏天、秋天到冬初这一段，老百姓都回到山里面。高大山岭都有老百姓，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这一段，敌人经常来搞，穿梭似的。秋收以后、清明以前，老百姓统统出山了，把谷子什么都带走了，把山空起来了，敌人没什么搞头就不来了。我们住在山里面最好，就是给养成问题，有一利就有一弊。这是斗争的两个阶段。

三年游击战争也不是天天都要打，有时紧张，最长有3个月，一直不停。西安事变以后，北方毛主席和他们讲好了，国共合作；南方他们就加紧消灭我们。他们害怕，北方已经搞出一个来了。他们怕南方也冒出一个，将来不好办。所以南方不同于北方，敌人加紧进攻，1月、2月、3月、4月是最高峰，天天搞，硬是弄得我们没有地方走。甚至把探照灯也搞得山里面，一圈圈地搞起来。马路上，庄稼地，他们都封锁，到处筑上碉堡，放上了队伍。搞洋油烧山，烧得野猪、山牛到处乱叫，很长的蛇到处窜，敌人到处喊叫，到处打枪，但这样也搞不到我们。

烧山并不可怕，因为敌人不能把山全烧光，老百姓没柴烧，要上山打柴，他们也只好让老百姓进山，派个队伍押着。老百姓呼噜呼噜进山来，利用这机会，到处丢东西，第二天我们去捡，能捡到很多的东西。能捡到报纸、纸烟、炒米、盐、干辣椒……敌人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比他们高明。这是敌人方面。

六、关于群众方面的情况

再讲老百姓方面。1926年这地方(信丰、南康、南雄、大庾一带)开始有共产党，搞起农民运动。北伐失败，以后成立苏区。苏区又失败，这样一次又一次，他们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既有失败经验，也有成功的经验。这点比中央苏区基本地区好，那里红军一到就成功了，建立了根据地；这个地方经过好多次暴风雨，有斗争经验，见多识广。反动派的大屠

杀，反动派的改良主义，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毒辣办法，他们都晓得。差不多每个庄子都被反动派杀过、烧过，他们也见惯了。他们和反动派、和地主结下很深的冤仇，所以没什么好多地主了，很多地主不敢回家。乡下的地主老实些，他们必须和老百姓取得谅解，遇事商量，讲好话，不然就不能存在，老百姓好多年不上粮、不纳税。

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是抽象、概念的，不是只说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共产党的队伍不错啊，共产党有红军，红军能打仗。他们认识得很具体，很深刻，他们从十几年的经验中认识了共产党，受屠杀，共产党和他们一起受屠杀，胜利时共产党和他们一起，失败时共产党也和他们一起。共产党那时候的政纲（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打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武装斗争，他们都知道，十几年的革命斗争把他们和共产党联在一起。他们说共产党和我们是一党。老百姓不叫共产党，叫“本党”，“你是哪一党”？“我是本党”。我们是一党，我们是同志。我们讲同志，他们讲“同志哩”（客家话。他要喊那个同志：喂，同志哩。）老百姓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觉悟是很高的。他们千方百计支援共产党。共产党在他们庄子里边，他们和共产党一道受屠杀，他们怨恨敌人，不报怨共产党；怨恨敌人的残酷，决不说共产党搞得他们吃亏。反动派宣传说，朱毛一走留下些烂“土匪”，害他们，他们要是离开，我们就不来杀你们。老百姓说没有共产党，你们杀得更厉害。有些老百姓、老头子、小孩子，还有些妇女，敌人确实知道他们支援游击队。敌人说，你给游击队买粮食、送报纸、买衣服、救伤兵，我们很熟悉，我们情报打听出来了，你还不讲？敌人这样来欺骗，最后吊起来打，吊到梁上，“鸭儿浮水”，还有压杠子，老百姓没有叛变。3年中，从来没有一个老百姓叛变。他们说：“我们要死只死一个，顶多死一个，不能害共产党。”他们就怕我们队伍里面有叛徒，主要是俘虏兵容易叛变，被俘过去，招不住就讲。那些平时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政治差，家庭生活较好的，回家还有一条路走，也容易动摇。老百姓讲：“我们是可靠的，就是你们自己队伍里的人要好好教育，不要

叛变了，害人。”差不多一见面就讲，的确危险，有些人今天在这儿吃了饭，在这儿买了东西，伤兵在这儿住了，老百姓很好地招待了。他一出庄子被抓了，叛变了，带着敌人回来搞。敌人为什么不搞上面一家，单搞你这一家？一定是有人告密了。所以老百姓最怕这个，老百姓不能叛变，他不能叛变整个家，整个地方。队伍上的人就不同，被抓了，保住他的一条性命，他就可以叛变，为敌人带路：哪个庄子？哪些人？特委机关、县委机关在哪里？哪地方有伤兵？哪里埋的有米……一网打尽。

所以说，老百姓对共产党不是抽象的了解，对国民党也不是抽象的了解，而是从切身的经历、流血的经验中知道的。对于国民党坏，什么人给杀了，谁的房子给烧了，那些老人家，那些小孩子，人人有笔血债。对哪年来了共产党，哪个共产党跟他们一道牺牲了，带伤了；他坐班房，共产党把他保出来；房子烧了，游击队拿钱帮助修；儿子当红军去了，做了军长、师长……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界限很清楚，不是抽象地了解。他们认定有一天共产党会翻身，革命只是暂时失败，暂时困难，将来一定能胜利。这个信念，家喻户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知道。老百姓不能叛变他的家乡，不能叛变他们的阶级。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知道讲出来依然要被杀，吊起来一打，受刑不过，你讲了，带着去抓些共产党，抓些人杀掉，你还是要被杀掉，害人害己。所以坚决不说，要死死一个。

老百姓这样子，也就教育了我们的游击队，教育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人家那样对我们，我们就要好好干，坚持游击战斗，不辜负人家。”这是很好的教育。我们有时候带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谈谈，那就等于上课。老百姓被打掉牙、打断手、打断腿、打断脚，房子烧了，东西抢得光光的……他们毫无怨言，我们没有人不感动地流泪。同样，我们队伍在山上吃草、吃树根、吃树叶，身上钱很多，并不是没有钱，却穿草鞋，大风大雪都穿草鞋，老百姓也非常感动。那时候钱很多，写个条子给地主，要他送上钱来，不然就派队伍去抓，那些家伙一送就几百。这样，老百姓的房子被反动派烧了，我们给钱，打死人我们马上送钱去，我们对他们很豪